

“四人邦”及其余党
在上海么编《党史》、篡改党史资料汇编

(初稿)

(供批判时参考)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办公室印

一九七八年六月

目 录

第一下分：“四人邦”及其余党在上海△编
《党史》的过程

第二下分：“四人邦”及其余党在黑《党史》
中采用反革命两派手法，篡改党
的光辉历史，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
命舆论

- 一、打着“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歪曲和篡改
毛泽东思想.....12
- （一）以“马列主义与革命运动相结合”偷换
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篡改党的
性质和阶级基础.....12
- （二）歪曲毛主席关于反对走资派的论述.....16
- （三）空喊革命，否定造设，阉割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16

(四) 篡改毛主席关于教育的科学论断, 为炮制“两个估计”制造“依据”	17
(五) 歪曲毛主席对孙中山先生的科学评价	18
二、以“突出毛主席”为幌子, 借口“历史情况复杂”, 抹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	19
(一) 以毛主席“代表着五四运动的方向”为幌子, 否定建党时期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21
(二) 借口“历史上情况复杂”, 叫吐“其他人尽易少写”, 贬低和抹煞革命老干下的历史功绩	25
(三) “突出毛主席”是假, 反对毛主席是真	37
三、借口“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 搞乱路线是非, 颠倒敌我关系	39
(一) 攻击各次武装起义领导人犯了“路线错误”	39
(二) 以“突出毛主席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为幌子, 否定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42
(三) 在“反对错误路线”的幌子下, 安丁子, 造假象, 诬陷革命前辈	43
(四) 以“强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幌子, 借口白区工作情况复杂, 抹煞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过的革命老干下	44
(五) 借口“批判错误路线”, 蓄意混淆两类矛盾, 把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打入“刘少奇一伙”	45
四、接过革命口号, 另搞一套, 形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	48
(一) 接过批林批孔口号, 假借“批孔”, 进行形射攻击	48
(二) 接过批投降主义口号, 别有用心地大批“投降主义”, 进行形射攻击	52
(三) 接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口号, 大批“经验主义”, 进行形射攻击	55
五、借口“突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鼓吹“黑线专政”论, 打击一大片, 抬出“四人帮”	57

(一) 鼓吹三十年代就“形成一条文艺黑线”	58
(二) 攻击抗战时期解放区文艺路线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继续和发尸	60
(三) 鼓吹解放以后的十七年，在文化领域是“黑线专政”	61
(四) 吹捧叛徒江专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	63

第三部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党史之传中 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 对华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

一、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69
(一) 狂叫“没有毛主席，也会有井冈山道路”	69
(二) 反对之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光辉论述	70
(三) 否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	70
二、反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71

(一) 诬蔑“周总理的世界观也是民主主义的”	71
(二) 诬蔑周总理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走的是“城市中心”的道路	71
(三) 恶忌抹煞周总理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功绩	72
(四) 借批孔文章形射攻击周总理	72
(五) 诬蔑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动思潮”	74
三、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	75
四、反对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75

第一下分 “四人邦” 及其余党在上海△编 《党史》的过程

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爱尔兰史〉的片断》）修正主义路线头子，都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为了篡党夺权，总是要篡改党的历史。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是这样，林彪是这样，“四人邦”也是这样。

张春桥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 授恣△拉班子，△编党史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指示说：要搞个党史，没有不行。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党校要有党史这个正式课程。（引自叶付主席一九七七年十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会后不久，张春桥窜来上海，以读“毛选”五卷（试排本）为名，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每晚把朱永嘉、肖木和王知常这几个屁上海市委写作组头目接到招待所，进行反革命路线交底。在这期间，朱永嘉问起老主持编写党史的事，张春桥

说：“这件事是有的，但是，毛主席说，编了党史也没有用，苏联斯大林主持编了联共党史，后来赫鲁晓夫上了台，还不是把联共党史都反掉了，重新编了苏共党史。”接着，他又居心叵测地说：“我看有下党史还是好的，还是应当有一下党史，总结党的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有了一下党史，即使将来修正主义上台，反掉了，毕竟也还是留下了记载，可以教育后人，多少会起一点作用。赫鲁晓夫在苏联上了台，联共党史也并没有都烧完嘛！印了那么多，要烧也无法都烧完。”^①

一九七一年五月，张春桥在上海拉起了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文章的起草小组。在小组会上，他说：“我有一个野心，就是要写一下‘毛泽东传’”^②，妄图把自己打扮成解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以达到“号令天下”、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朱永嘉伺机向张春桥请示编写《党史》的问题。张当即授意说：“中央暂时不会编党史，康老、邓老年纪都很大了，你们可以找几个人先搞起来。”^③“地方先搞起来，将来中央再搞。中央搞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从各地编的党史中挑选一本好的；二是从各地党史班子中选人到中央来编。”^④

① 摘自王知常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揭发交代。

② 摘自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负责人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③ 摘自朱永嘉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揭发交代。

④ 摘自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还说：“联共党史也是地方先搞，以后斯大林自己抓了，这本书就成为中央的党史了。”^①张春桥当然知道，编纂党史权在中央，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编《党史》是非法的，因此又说：

“你们这个班子不要散，但也不要成立（党史研究）机构，否则，将来搞起运动来难办！”^②言下之意，就是要朱永嘉等人拉班子，但不要公开成立正式机构。

张春桥的编《党史》和编《毛泽东传》，是相辅相成的反革命阴谋，同赫鲁晓夫一上台就篡改《联共（布）党史》和《列宁传》的卑劣伎俩如出一辙。但张春桥还没有上台，就要急于上马，更显出了疯狂性。会后，朱永嘉、王知常兴奋异常，叫吐：“写‘党史’的‘令箭’拔来了，现在先专心写好‘七一’文章，等到文章一发表，‘党史’就好上马了。”^③果然，《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发表，朱永嘉等人就说，这下“理论根据”有了。“从此就铺开摊子大搞”。^④

“四人帮”及其余党拉党史班子

严密控制黑《党史》的编写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以及吴

① 摘自朱永嘉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揭发交代。

② 摘自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③ 摘自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三月揭发交代。

④ 摘自肖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揭发交代。

瑞武策划成立了“党史组”。他们向党史组负责人交了张春桥编《党史》的底，这个负责人也说，党史“地方无权出版，但是看来消极等待是不行的。”^①

△拉的党史组，见不得阳光。朱永嘉使出“冒名顶替”的手法，对党史组负责人说：“要注忌保密，公开的说法是为大学编一本党史教材。”^②尽管这个组与复旦大学毫不相干，却挂起了“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的招牌。朱永嘉等人还给这个△拉的班子规定了森严的纪律，并由吴瑞武严密加以控制。吴瑞武“向党史组反复强调：不许对外泄露‘领导’指示，不许向外人议论组内情况；不许暴露党史组与写作组的关系，外地来访要以‘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名义在复旦接待；不许搞△人资料，不准把党史资料印发给个人。”^③他们这样做，就是因为△编的《党史》是一下“最危险的书”^④。

朱永嘉拉起这个党史班子，是一心想为“四人邦”篡党夺权效劳，向“四人邦”邀功。他曾△下对吴瑞武说：“我们的班子拉得最早，要努力把这下党史编好，争取将来被中央（即“四人邦”）选中。”“这本党史不管编得怎么样，只要把资

① 摘自原党史组负责人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对杭州大学两同志的谈话。

② 摘自朱永嘉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揭发交代。

③ 摘自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④ 摘自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九日王知常在写作组编写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黑话。

料收齐，至少可以为张春桥写‘毛泽东传’提供一个基础。”^①朱永嘉、王知常每次向张、姚书百汇报写作组季度和年度写作计划时，在编书项目里，都要写上这本黑《党史》，张、姚都予以肯定。

“四人邦”及其余党△编《党史》

的所谓“指导思想”

以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为名△编《党史》，是完全按照“四人邦”的反革命忌图进行的。早在一九六九年，张春桥在向朱永嘉等进行反革命路线交底时，就“借读毛选五卷为名，歪曲、捏造党史。张一方百是诬蔑、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另一方百是吹捧‘四人邦’，特别是吹捧他自己”^②，从而为篡改党史定下了基调。“后来，由吴瑞武主持编写‘党史’时，朱永嘉和肖木也陆续将这些黑议论告诉了吴，使之在‘党史’中得到反映。”^③党史组成立前后，“四人邦”及其余党又陆续下达了一系列黑指示，作为编写《党史》的所谓“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四人邦”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两派派的特点。例如：

(1)“要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度去编写党史”^④。

① 摘自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②③④ 摘自王知常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揭发交代。

这是“四人邦”及其余党为黑《党史》的编写规定的基本方针。江专叫吐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张春桥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就是“批老干下，解决老干下的问题”。所谓“站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度”，也就是要站在“四人邦”的角度，为他们“改朝换代”服务。

(2) 要“突出毛主席”。这是林彪和“四人邦”假左真右的典型表现。朱永嘉也口口声声叫吐要“突出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和革命著作的主要内容”，实质上却是为了“尽量少提其他人的名字”^①，抹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他们“突出毛主席”是假，架空和反对毛主席是真。

(3) 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这是写在黑《党史》“说明”上的开宗明义第一条。“四人邦”三句不离“路线斗争”。姚文元提出：“研究党史，还是要研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研究正确路线是怎样战胜错误路线的”^②，并且强调要写党“和机会主义分歧”，“要从当前的斗争来考虑，来展开”，“讲民主革命时期也要针对现实来讲”^③。其实质，就是要颠倒路线是非，把“四人邦”吹捧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下。

① 摘自朱永嘉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揭发交代。

② 摘自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二月六日揭发交代。

③ 摘自姚文元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谈话记录。

(4) 要“突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是“四人邦”借此抬出他们自己的又一手法。吴瑞武说过：“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线，过去党史对这方百写得少。现在要有足够的篇幅和地位来反映这条战线的斗争。”^①这个黑《党史》大主编的罪恶目的在于：从这里打开缺口，抛出“黑线专政”论，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打击一大片，把“四人邦”塞进黑《党史》。

(5) 要“大批判开路”。这个“最最革命”的屁则，又是吴瑞武按照“四人邦”的调子提出来的。他叫嚣：“编写党史要‘大批判开路’，批判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②屁党史组负责人也说：“旧党史教材，这是以胡乔木《三十年》为纲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否定了。”^③这种论调，是林彪、“四人邦”“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在党史研究中的反映。所谓“大批判开路”，是不折不扣地为篡改党史“开路”。

黑《党史》的出笼及其流毒

正是在这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思想”指导下，经过两年

① 摘自余子道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揭发。

② 摘自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吴瑞武在党史组成立会上的黑话。

③ 摘自原党史组负责人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对杭州大学两同志的谈话。

的炮制，黑《党史》的十六开大字本，于一九七三年七月，党的“十大”召开前夕出笼了。朱永嘉一百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原上海市委常委“审查”，邀功诌赏；一百又急不可待地把这黑《党史》的民主革命下分交给复旦大学影印，作为“教材”。

这本黑《党史》的出笼，受到了“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重视。马天水拿到黑《党史》后，表示“恣到很高兴”，他还学着张春桥的腔调，说什么“不要等中央，地方可以先搞起来”^①。徐景贤还没有拿到书，就狂叫要带上黑《党史》，去“十大”“呼吁”^②。九月，姚文元针对这本黑《党史》下黑批示说：“未看。迨议谨慎从事，征求恣见，不要发出，若有提到我的名字一律删去。”^③朱永嘉对这个批示是心领神会的。他说：“‘未看’，就是看了，这本党史祇是备过案了，可以放心地使用了。”^④王知常的领会是：“姚的目的是要进一步突出江专，怕突出了自己，引起江专的不快。”^⑤于是朱永嘉就把十六开本的第七章删去，交复旦大学正式排印成三十二开本，“放心地使用”了。十一月，张春桥为了扩大黑《党

史》的形响，竟然不顾毛主席对《联共（布）党史》的全百评价，叫嚣要“破除联共党史的形响”，进一步多改黑《党史》。他给朱永嘉的黑指示说：“这本‘党史’没有摆脱联共党史的形响。我们写党史要破除联共党史的形响，不要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枯燥乏味。你们可以读一读司马迁的《史记》。要写得生动具体，有情有景，引人入胜。字数可以不受限制，上册写一百万字也可以。”^①朱永嘉接到这个黑指示，立即要党史组组织人力，多改上册。到了一九七四年冬，朱永嘉、吴瑞武为密切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又授恣“要注恣结合现实斗争”，“同现实斗争有关的一些问题上，增加点新内容”^②，下令多订七三年版。于是在七五年下半年又出笼了七五年版的黑《党史》，增加了不少关于所谓“批孔”、“批投降主义”和“批经验主义”的内容。

“四人帮”及其余党严密控制下编的黑《党史》，采用各种反革命两派手法，篡改和伪造党的历史，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规定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提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提纲》要以这黑《党史》为兰本，进行缩编，并须经他们控制的党史组审稿。这两种中学教

① 摘自吴瑞武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揭发交代。

② 摘自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③ 摘自姚文元在朱永嘉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六日信上的黑批示。

④ 摘自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⑤ 摘自王知常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揭发交代。

① 摘自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② 摘自余子道一九七八年四月揭发。

材，共印了一百万册以上。此外，朱永嘉还把这下黑《党史》作为函授教材，发至江西、云南等地。通过教学、函授，黑《党史》流毒全国，影响极坏。

“四人邦”及其余党扩大编《党史》的罪恶活动

在党的“十大”以后，“四人邦”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也进一步利用党史宣传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效劳。张春桥发出黑指示：“党史上的正反百人物都要写传记。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可以写叛徒传。”^①朱永嘉立即领会了这个黑意图，决定把黑《党史》化整为零，出版《中国现代史丛书》。他对吴瑞武说：“地方不能出党史，我们就出小册子，按事件、人物、问题来编写，每年出它一、二十册，几年以后就可以出六、七十册，合起来就是一下党史。这个办法叫做化整为零。先挑容易写的写起来，以后再怏怏地写全它。”^②第二年五月，朱永嘉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仗，说：“我们现在搞了一个目前能着手进行的初步的选题，有的可以作为文章，有的作为小册子公开发表，有的只能作为内下收集和歪理的资料放在那里，到将来适当的时候才能公开，这一切都需要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朱永嘉又通过陈兆德向张春桥当百汇报了选题计

^① 摘自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② 摘自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划，并表示他还准备进一步“搞军史”和“搞迨党以来有关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汇编”^①。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四人邦”及其余党更加猖狂地扩大编《党史》，篡改党史、军史的狼子野心。

覆灭前的猖狂一跳

一九七六年九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四人邦”进一步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朱永嘉不仅决定在《学习与批判》上连载《毛主席在井冈山》，十万火急地催促编定《毛主席在闽西》等稿件，积极为张春桥编《毛泽东传》“提供基础”，而且公然对抗中央关于地方无权出版党史的规定，决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黑《党史》，妄图为“四人邦”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声势。只是由于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邦”，这一阴谋才未能得逞。

^① 据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核心成员陈冀德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四日揭发交代。

第二下分 “四人帮” 及其余党在黑《党史》 中采用反革命两派手法，篡改党的 光辉历史，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 命舆论

一、打着“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歪曲和篡改 毛泽东思想

按：“四人帮”及其余党经常冠冕堂皇地说些好话，其实是为了夹带鬼话和掩盖鬼事。他们以“突出毛泽东思想”为名，行篡改毛泽东思想之实，就是一种表现。

(一) 以“马列主义与革命运动相结合”偷换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篡改党的性质和阶级基础

这篇文章（注：指《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的前言第二段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一句是张春桥写的。……张春桥把这段改稿寄来后，朱（永嘉）、王（知常）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提法，都一致叫好。王知常说：……这是区别于旧党史的一个新提法，它

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性质。朱永嘉说：张春桥讲过，中国的工人运动是不典型的，它不能同西欧和俄国的工人运动相比。我认为五四运动也不是单纯的工人运动，吹捧这句话是一种新提法，竭力加以宣扬，写进所谓“党史”里去。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揭发交代）

一九七一年八月，吴瑞武在党史组讲解《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时，对于“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提法，作过如下解说。他说：过去的提法，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现在多改了一下，提“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两个提法并不是对立的，革命运动包含工人运动在内。不过，中国的实际情况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工人运动不发达，单提工人运动不完全符合实际。中国还有青年运动、学生运动、思想文化界的运动等等，都很活跃，五四时期就是如此。所以提“马列主义和革命运动相结合”，更为恰当。这种情况，不仅中国，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有相类似的情形。上述论点，吴瑞武还在上海图书馆、文汇报社等处讲课时讲过。

（余子迈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揭发）

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革命运动”怎样理解？

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外国提法，也不错，但与中国不同。中国情况，工人运动不是主要的，如果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同当前亚非拉造党情况也不符合。“五四”时期比较发达的是知识分子的三个联盟，当然也包括工人运动，不是孤立的工人运动。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打头阵，中国农民运动比较发达。工人运动从“六·三”起，但工人参加造党的很少，主要是知识分子，不过有些人投机革命，后来变为反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提法，是中央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科学结论。中国创党情况与十九世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创党情况是不相同的。

(原党史组负责人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对杭州大学两同志的谈话)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结合的基础上，造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成熟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三年版上册第15—16页 七五年版第23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七三年版上册第61页 七五年版第72—73页)

注：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有许多明确的论述。如：“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造立了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论联合政府》）

我党中央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尸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尸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

黑《党史》按照张春桥的调子，以“革命运动”偷换“工人运动”，是篡改毛主席的有关论述，篡改党的性质和阶级基础。

(二) 歪曲毛主席关于反对走资派的论述

这个文件（注：指《二十三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个极其重要的屁理。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和国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所得出的这个新结论，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

（七三年大字本第460页 七五年版第611页）

注：毛主席在深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状况和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了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黑《党史》抛开在社会上还是一个很大力量的新老资产阶级，片面强调同走资派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方向”，配合了“四人帮”把老干部打成“走资派”，把“斗走资派”作为“大方向”的反革命逆流。

(三) 空喊革命，否定建设，阉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我们获得了全国政权，就以此作为基本条件，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

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论人民民主专政》）

（七五年版第389页）

注：黑《党史》在此处拦腰砍掉了屁文中“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这样一句。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努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下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下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七三年版下册第94页 七五年版第487页）

注：黑《党史》在此处抹掉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下矛盾的问题》屁文中紧接着的一段重要指示：

“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四) 篡改毛主席关于教育的科学论断，为炮制“两个估计”制造“依据”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主席发表了春节谈话，深刻揭

露了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统治的严重现象，明确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专年，我很不赞成。”

(七三年版大字本第481页 七五年版第619页)

注：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黑《党史》删掉这一重要指示，是蓄意篡改毛主席斥责，为“两个估计”制造反革命舆论。

(五) 歪曲毛主席对孙中山先生的科学评价

一九七一年七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发表后，王知常在荣昌路60号借题发挥，大肆攻击孙中山先生，说什么：孙中山好就好在死得是时候。他要是多活几年，肯定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的位置还是他的。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揭发交代)

一九七一年八月，在讨论《党史》第一章时，吴瑞武说：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消灭。对他们的代表人物，我们再也不能去扩大他们的影响了。如象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写党史，不能再去扩大孙中山的影响，而且要找地方刮他一下。”

(余子迈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揭发)

孙中山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抱着恢复约法和国会的目的进行“护法”斗争，但是象潮湿了的鞭炮一样发不出声响来，挣扎了一年，徒为军阀政客所挟持，落得个孑然无助，颓丧而去。

(七三年版上册第6页 参见七五年版第8—9页)

注：毛主席对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多次作过科学评价。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象很多站在正百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百。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四人邦”及其余党却同毛主席的科学评价唱反调，攻击孙中山先生，并通过黑《党史》进行讽刺挖苦。这也暴露了“四人邦”及其余党蓄意破坏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反革命阴谋。

二、以“突出毛主席”为幌子，借口“历史情况复杂”，抹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

我以要突出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和革命著作的主要内容

为借口，要作者尽量少提其他人的名字，所以这本党史贬低和攻击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朱永嘉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揭发交代)

朱永嘉一九七一年七月说：党史上除了毛主席之外，其他人尽量少写。历史上情况复杂，不好写。

(余子迈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揭发)

在拉起编黑《党史》班子后，朱永嘉说：“党史上写活人要特别当心。写了这个，那个不高兴；写了那个，这个不高兴。所以，除了主席外，能避开的要尽量避开。”“对老革命家要注忌‘摆摆平’，除了主席外，不要过于突出某一个人。”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揭发交代)

我并亲自动手，在黑“党史”的第一页加了一个“说明”，明确地写上：“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毛主席的著作为基本教材。这份讲义，是作为本校党史课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导资料而编写的。”实质上，所谓突出毛主席，就是要架空毛主席，所谓写毛选的背景，就是反对写具体历史情节，这样就一笔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勋抹煞了。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三月揭发交代)

(一) 以毛主席“代表着五四运动的正确方向”为幌子，否定建党时期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1、把李大钊同志打成“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

一九六九年夏，在所谓读毛选五卷过程中，朱永嘉、王知常问张春桥关于党史上李大钊的评价问题。张说，李大钊可以说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王知常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揭发交代)

对李大钊同志，我曾攻击他晚节不终，向姚文元建议，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姚文元批示：“可以试试看。”

(朱永嘉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揭发交代)

注：朱永嘉攻击李大钊同志“晚节不终”，这是造谣诬蔑。李大钊同志在敌人的绞刑架下英勇不屈，从容就义，始终是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学习的榜样。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吴瑞武到党史组对李大钊同志进行攻击：“李大钊在建党时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文章中，有大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本主义观点。”“李大钊当时写的《东西方文化之比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基本观点还是资产阶级的，不是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要翻以李大钊为五四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的案。文化大革命前，说李大钊是十月革命后，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这个案要翻。”

(余子迈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揭发)

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批驳王明等人自吹中国在他们之前没有马克思主义时就明确说过：事实不是这样，没有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那时候李大钊同志就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有书为证。

马列主义传播与“五四”时期三次论战难写。……

当时论战的主要两派：李大钊和胡适，几次大论战，李大钊和胡适两派，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与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争论，是资产阶级内斗的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论战，……资产阶级民主派李大钊、陈独秀欢迎十月革命，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原党史组负责人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对杭州大学两同志的谈话)

黑《党史》对李大钊同志的污蔑：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新青年》发

表了两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作者李大钊，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在一片歌颂“公理战胜强权”，称赞欧战胜利的舆论声中，这两篇文章首先宣传了十月革命，曾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它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来欢迎十月革命的，因而不能正确地认识与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七三年版上册第8页 参见七五年版第14页)

黑《党史》影射攻击李大钊同志：

陈独秀等人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批判，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一九二〇年九月把《新青年》改为小组的机关刊物，十一月七日又创办了秘密的《共产党》月刊。他们以这两种刊物为主要阵地，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斗争，在翻译介绍一些马、列著作和国际共运经验等方面，曾起过作用。但是，陈独秀等人根本不认马克思主义，他们在这些刊物上写的批判文章，不仅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且继续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

(七三年版上册第14页 参见七五年版第21—22页)

2、制造借口，否定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书中历来提到早期共产主义者，除了毛主席以外，还有总理、茅和森、向警予、恽代英、邓中夏等人（注：查初稿中提到的是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三位同志）。我要作者除了主席外，其他的人尽量少提，这样其他的人也都删了，这样也就是不承认总理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

（朱永嘉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揭发交代）

朱永嘉一九七三年上半年在写作组讨论黑《党史》第一章初稿时说：总理自己说过五四时期还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尊重总理自己的意见，不要“帮倒忙”。

（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听了朱永嘉的话（注：即朱永嘉的上述黑话）我心领神会，立即想起这是前不久，即同年七月，徐景贤在所谓传达周总理在批林歪风汇报会上的党史报告时说的；而徐景贤当时对我说：叫你来听听，是因为你是搞党史的。这正是要把他借此贬低敬爱的周总理的意图反映到所谓“党史”中去。因此，我就无视历史的真实，拿起罪恶的笔，就在这一处把周总理的光辉名字删去了……

（吴瑞武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揭发交代）

李大钊不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了，总理也不提了，留下邓中夏、恽代英两个名字，反而不好，索性就笼统地提以毛主席为代表，其他都不具体提名了。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揭发交代）

黑《党史》定稿时删去了周恩来等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光辉革命事迹，删去的一段全文如下：

在五四运动期间，全国许多地方也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北京，邓中夏是最早在长辛店开埠工人运动的，并且早就和毛主席有密切联系。周恩来等同志组织的“觉悟社”，领导着天津的群众斗争。在武汉，恽代英同志等组织利群书社进行革命斗争。

（摘自黑《党史》一九七二年初稿第20页）

五四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斗争中成长，是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下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的具体体现。

（七三年版上册第12页 七五年版第19页）

（二）借口“历史上情况复杂”，叫吐“其他人尽量少写”，贬低和抹煞革命老干下的历史功绩

朱永嘉一九七一年七月说：“我们党的历史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只有毛主席等几个人，许多人是在一个时期内团结共事，到另一个时期就分道扬镳。写这些人说不清楚，多写主席，其他人尽量少写。”“俄国共产党在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七年革命前的中央主要负责人，除列宁、斯大林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都垮台了，能够始终站住的，只不过列宁斯大林等几个人。苏联是这样，中国党也有这样的情况。”

（余子边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揭发）

朱永嘉一再吹风说：党史为什么难写呢？因为党史上一些人既有功劳又有错误，不好办。他们这些人还在，不好写。

（余子边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揭发）

王知常一九七三年上半年说：写活人真叫吃力不讨好，只有傻子才干这种事。人只有盖棺才能论定，还有盖了棺还定不了的呢！

（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1、贬低和抹煞周恩来总理的历史功绩

按：敬爱的周总理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久经考

验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周恩来总理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英勇斗争，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周总理的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黑《党史》不是一笔抹煞，便是轻轻带过，全书竟没有一个地方对周总理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党的历史上的崇高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下页是其中的几例。

在党史组讨论提纲时，曾有同志提出要写旅欧支下。有一次我向朱永嘉汇报讨论情况，朱恶狠狠地说：旅欧支下人员比较复杂，有的人一直没有出来，你们写它有什么意思？我领会到朱永嘉的这句话，主要不是说有的人一直没有出来，因为旅欧支下是总理领导的，是完全肯定的，不写旅欧支下，就是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因此，我也就借口情况复杂，不要在黑“党史”写旅欧支下。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三月揭发交代）

黑《党史》定稿时抹煞了周恩来同志协助毛主席指挥直罗镇战役的历史功绩：

按照已经确定的下署，中央红军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以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主席、周恩来付主席亲临前线指挥。

(摘自黑《党史》一九七二年初稿第69页)

十一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经过充分的准备，……占领了直罗镇。

(七三年版上册第128页 七五年版第140—141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同年六月，又在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再次重申并确认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七三年版下册第161页注释^⑤ 七五年版第559页注释^⑤)

注：一九五四年，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周总理的这一伟大历史功绩，黑《党史》仅仅写了一个“注释”，而且根本不提周总理的光辉名

字，蓄意加以抹煞。

一九五八年一月至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浙江、广西、辽宁、吉林、四川、湖北、上海、广东等省市，深入工厂、农村、矿山和科学研究单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七三年版下册第109页 七五年版第503页)

在一九五八年夏秋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毛主席又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会见了工人、农民、干部和学校师生。

(七三年版下册第121页 七五年版第516页)

注：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我们党和国家和其他两位主要领导人——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也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对许多省市的工厂、农村进行了视察。黑《党史》一字不提，一笔抹煞，贯彻了朱永嘉“除了主席外，能避开的要尽量避开”的黑忌图。

2、抹煞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的历史功绩

按：朱德委员长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久经

考验的亲密战友，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可是在黑《党史》中，却被肆意抹煞，全盘否定。下面是其中的几例。

从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八月十日，延安总司发布了大反攻的命令，要求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立即向敌人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如迂顽抗，“即应予坚决消灭”。

（七三年版上册第241页 参见七五年版第306页）

注：毛主席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中明确指出，这一命令是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司发表的，并充分肯定了这个命令（见《毛选》一卷本第1035页）。

四月二十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七三年版上册第307页 七五年版第376页）

注：毛主席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文中明确写着这一命令是他和朱总司令联名发布的（见《毛选》一卷本第1340页）。

朱永嘉说：“七一”文章第二下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纲”，这里虽然没有具体写历史事件和人物，但是路线斗争讲透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思想讲清楚了，“党史”就按这个“架子”去写，不一定要象上册那样具体，人物可以不出场。对于朱永嘉的用心，我是完全领会的。……这样，在我的授意下，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等都不出场，全部抹煞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功勋。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三月揭发交代）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举行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一九六五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并决定更加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比、学、赶、帮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五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保证和促进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七五年版第601页）

注：朱德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人大委员长，第三、第四届人大又继续当选为人大委员长。黑《党史》却根本不写二届人大，而在写三届人大时，又不写选举和决定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这项重要议程，蓄意不提朱德委员长。

3、贬低和抹煞叶剑英付主席的历史功绩

紧接着秋收起义之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又爆发了广州起义。党的广东省委利用广东军阀张发奎、黄琪翔与广西军阀黄绍竑为争夺广东地盘而混战的时机，以广州工人赤卫队和叶剑英同志率领的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发动了武装起义，并成立了工农兵政权——广州公社。

(七三年版上册第75页 七五年版第87页)

注：黑《党史》把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叶剑英同志贬低为一介分起义武装的指挥。真是挖空心思。

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路线，当左路军通过草地进驻阿坝后，他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命令，反诬中央红军是逃跑主义，公开在军队中进行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甚至

阴谋以武力截击中央，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紧急形势下，党中央于八月二十九日在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同时把一方百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支队，以实现毛主席的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部署。

(七三年版上册第126页 七五年版第138—139页)

注：张国焘妄图以武力截击中央，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阴谋活动，是叶剑英同志发现并向毛主席报告的。毛主席得到报告，及时地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可是黑《党史》只字不提，抹煞了叶剑英同志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边，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作出的巨大功绩。

4、蓄意抹煞邓小平付主席的历史功绩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广西右江成立了红七军，并建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

(七五年版第104页)

注：黑《党史》不只是一九七三年版中把邓小平同志排除在外。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但这时多改再版的黑

《党史》，竟仍然不提是邓小平同志领导了右江起义，并建立了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为了进一步揭露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团结教育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我党中央仍按照原定计划派代表团去莫斯科。七月五日，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

(七五年版第586页)

注：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充分肯定邓小平同志在反党斗争中的功绩。一九六三年七月，党中央派出了以邓小平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和苏党叛徒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可是，一九七五年版的黑《党史》，仍然不提我党代表团是邓小平同志率领的。

5、抹煞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

张春桥攻击陈毅同志说：上海迷信陈毅的人可不少，不肃清陈毅的形响，上海人民的思想不得解放。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四月揭发交代)

黑《党史》蓄意抹煞陈毅同志历史功绩的有关内容：

红四军路线也

王明拒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顽固地认为徐州失守后抗日的战略中心是“保卫大武汉”，仍然把华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而不去组织沈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结果，城市的革命力量没有适时地转到农村，使我党丧失了长江流域发尸革命武装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七三年版上册第179页)

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付军长项英，却拒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继续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仍然不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七三年版上册第201页)

到一九四〇年，新四军已在淮南、苏北、苏中、苏南、予北、江北、皖东北、鄂予等地区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淮南、苏中、苏北、苏南，予皖边区等根据地普遍地建立了县、区、乡的人民政权。

(七三年版上册第207页)

注：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同志是新四军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代表，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毅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率部挺进江南，创造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坚决执行毛主席、

党中央关于《放手发兵抗日力另，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深入苏北，亲自指挥了黄桥战役，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在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军部随即能在苏北重建，是和陈毅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分不开的。然而在七三年版的黑《党史》中，只见指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项英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却极力抹煞陈毅同志的历史功绩，即使讲到新四军开辟抗日根据地，也不提陈毅同志。

黑《党史》蓄意抹煞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历史功绩的有关内容：

这时（注：指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又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红二方面军同意他的错误路线，共同反对中央。但这一罪恶企图遭到红二方面军的拒绝而完全失败了。

（七三年版上册第129页 七五年版第142页）

注：当时，领导红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路线作斗争的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黑《党史》用泛指的手法，以“红二方面军”的字眼，偷换了贺龙等同志的名字，这就抹煞了他们同张国焘作斗争的历史功绩。

（三）“突出毛主席”是假，反对毛主席是真

按：“四人帮”及其余党以“突出毛主席”为幌子，肆意篡改党的光辉历史，极力贬低和抹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归根到底，是为了架空毛主席。这也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大的诬蔑。下面的一些资料进一步证明：这一伙新老反革命“突出毛主席”是假，反对毛主席是真。

1、张春桥造谣污蔑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以后才看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笈

一九六九年夏，张春桥借读“毛选”五卷为名，造谣攻击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是^{刘安恭？周？}□□□同志说的。毛主席当时憋了一肚子气。打开遵义城后，搞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笈，当时毛主席身体不好，行军时只能躺在担架上，毛主席在担架上看书，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书笈都看了。

（王知常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揭发交代）

2、张春桥明攻朱德同志，把矛头暗指毛主席

张春桥一九六九年夏，借读“毛选”五卷为名，攻击朱德委员长说：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蒋介石给八路军发了十万银元的军饷，朱总司令和彭德怀等人都高兴了，其实这个钱

是拿不得的，结果军队内下右倾思想就抬头了。

(王知常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揭发交代)

3、吴瑞武蓄意抹煞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攻击毛主席革命军事路线

对编写党的“七大”下分，吴瑞武授意说：朱德的军事报告，路线没有把握，避开，不要写。

(余子迈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一日揭发)

在党的“七大”一节只字不提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的重要报告，形射攻击“七大”正式通过的这一重要报告所谓在军事路线上还没有定论。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三月揭发交代)

4、黑《党史》七五年版删去颂扬毛主席的话

注：黑《党史》七三年版在叙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写过：“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育下，中国共产党迎着革命的风暴，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了。”（见上册第16页）七五年版把这句话删去了。

三、借口“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搞乱路线是非，颠倒敌我关系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

(摘自黑《党史》“说明”)

按：下页的资料证明：黑《党史》完全是以此为借口，极力搞乱路线是非，颠倒敌我关系。

(一) 攻击各次武装起义领导人犯了“路线错误”

1、攻击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的路线是“错误”的

张春桥主持起草的“七一”文章强调南昌起义“错误的方面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意即南昌起义的路线是错误的。我参与了这一文章的起草，对此在当时就是心领神会的。……△编“党史”开始后，朱永嘉反复强调要以“七一”文章为纲，加水进去把它化化开就行了。我领会到用这种方法反对和贬低敬爱的周总理是最容易使人接受而又不易被人识破的。因此，我进一步强调凡是在“七一”文章中提到的历史事件，在△编黑“党史”时，都要按照“七一”文章的提法。就这样，这句话被抄进了黑“党史”，借此来贬低敬爱的周总理。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三月揭发交代)

南昌起义的正确方百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一百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错误的方百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迨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

(七三年版上册第73页 七五年版第85页)

2、攻击张太雷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的路线是“错误”的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布置我参加写一篇批判欧阳山同志的小说《一代风流》的文章。朱、王交代说，此文是姚文元叫写的。在讨论文章初稿时，朱、肖、王都强调要从政治上批，要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批。当时，朱、肖、王都讲到广州起义，说：“广州起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路线是错误的。不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边路，而是搞城市起义。”文章题目也被改为《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评欧阳山的〈一代风流〉》。

(尻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人员徐绎熙同志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揭发)

吴瑞武说：“有些人领导工作的路线不对，不能写他，但最后还是牺牲的，在写到牺牲的地方，可以提一提”。他的忌思是广州起义的路线不对，但张太雷同志在起义斗争中牺牲

了，可以提。

(余子边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揭发)

但广州起义也没有认识到迨立农村根据地的必要性，队伍没有及时转移到附近海陆丰农村，同农民起义力舅相结合。当国民党反革命军队五万多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围攻广州时，虽经三天三夜的血战，终因敌我力舅悬殊而告失败。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同志也在战斗中牺牲。

(七三年版上册第75页 七五年版第87—88页)

3、以突出方志敏同志的手法，形射攻击许多武装起义的领导人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此外，还有方志敏领导的江西横峰、弋阳等县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彭湃领导的广东海丰、陆丰起义，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张鼎丞、邓子恢领导的闽西起义，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以及湖北、河南、江苏、河北、山东、四川等地的起义。特别是方志敏同志领导的横峰、弋阳起义，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将起义队伍迅速转入山区，坚持艰苦的沈击战争，不断扩大革命武装，创造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七三年版上册第75—76页 参见七五年第88页)

……我还特意加上了“特别是方志敏同志领导的横峰、弋阳起义，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段话，不仅进一步突出了广州起义的所谓“路线错误”，而且直接否定和贬低了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起义，彭湃同志领导的广东海丰、陆丰起义，谢子长、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张鼎丞、邓子恢同志领导的闽西起义，滕代远、黄公略同志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等等，把这一列系的起义都打成犯了“路线错误”。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三月揭发交代)

(二) 以“突出毛主席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为幌子，否定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吴瑞武在一九七一年起草《党史》编写提纲时，他说：写革命战争要突出写主席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不要写将军、指挥员个人的作用和他的指挥才能。一九七四年，吴瑞武又对我说：《红旗》上一篇《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的文章，是值得读一读的。秦国的大将武臣固然不少，但六国也有许多名将，为什么秦能统一六国，而其他国却不能。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将军的才能如何，而是秦的政治路线正确。武将即使打了胜仗，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路线。吴瑞武为了抹煞我军领导干部的功绩，故意把路线和干下对立起来。

(余子迈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揭发)

注：在吴瑞武的授意下，黑《党史》很少写到我军指挥员的名字，特别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甚至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和参谋长叶剑英等同志的光辉名字也不见了。

(三) 在“反对错误路线”的幌子下，安丁子，造假象，诬陷革命前辈

左路军由朱德同志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从卓克基出发后，原定经上下阿坝出草地，进至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路线，当左路军通过草地进至阿坝后，他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命令，公开在军队中进行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甚至阴谋以武力截击中央，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

(七三年版上册第126页 七五年版第138页)

在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毛儿盖会议后一段，(我)删去了朱德同志同叛徒张国焘坚决斗争的具体情节，但保留了朱德同志在张国焘任政委的左路军中的总指挥职务，用以恶毒攻击敬爱的朱总司令。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三月揭发交代)

鄂予皖根据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红军第四军、第二十

五军等下组成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开始时曾给进犯的敌军以重大的打击。但当时窃据红四方面军领导职位的张国焘，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已经是“偏师”了，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而不作继续反“围剿”的准备。当敌人再发动进攻时，又惊惶失措，没有得到党的允许，便率主力于一九三二年十月退出鄂豫皖区，转到了川陕边界。

(七三年版上册第112页 七五年版第124页)

注：这里，黑《党史》在提到徐向前同志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之后，借着批判张国焘，含沙射影地诬陷徐向前同志。

(四) 以“强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幌子，借口白区工作情况复杂，抹煞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过的革命老干下

吴瑞武多次贩卖张春桥的白区工作比黑一团论，反对在党史上反映白区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其他民主运动。吴瑞武在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五年几次说：“春桥××多次讲过：不要写城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你上海的工人、学生，还不是农民把你们解放出来的，有什么好写的！我历来主张不要写白区城市斗争。”

(余子边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七三年上半年朱永嘉说：上海白区工作很复杂，很多地下党的线没有搞清楚。搞党史和小册子少去碰工人运动一类的东西，弄得不好搞到刘（少奇）的线上去，你还不知道。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揭发交代)

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党在国统区工作的干部同样对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都到国统区工作过。黑《党史》在张春桥的授意下，以强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幌子，借口刘少奇在国统区推行一条错误路线，极少写到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从而否定了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

(五) 借口“批判错误路线”，蓄意混淆两类矛盾，把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打入“刘少奇一伙”

我通过贯彻“四人帮”及其余党朱永嘉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出来的都不上“党史”的黑指示，把敬爱的邓付主席和贺龙同志排除在所谓“党史”之外。下册还用“刘少奇一伙”恶毒影射攻击邓付主席等等。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三月揭发交代)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呼应，企图阻碍广大贫下中农走合作化的道路。……一九五五年五月，右倾机会主义者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召开了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不顾党中央在四月间提出的“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的警告，制定了“订”、“缩”、“套”的反动方针，大砍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刘少奇一伙的猖狂破坏，使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好形势，一时变得乌烟瘴气，阴霾满天。

(七三年版下册第67页 七五年版第459—460页)

自从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把持着这一条战线的领导职位的刘少奇一伙一直千方百计地进行对抗。他们对于几年来为煽动复辟资本主义而放出的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不组织批判，还继续放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占领我们的思想文化阵地。

(七五年版第614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足道路上也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刘少奇一伙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他们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否定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

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他们叫吐发尸生产技术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学不到就买”，提倡“借买外国专利来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甚至胡说什么“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

(七五年版第607页 参见七三年版大字本第471页)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刘少奇一伙继续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把革命和建设对立起来，只讲建设，不要革命，只讲发尸生产力，不准改革生产关系，只讲生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竭力宣扬“业务挂帅”、“技术第一”。说什么：“企业的第一位任务是生产，生产不好，政治是空的。”他们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只讲物质因素，不讲精神因素，见物不见人。他们主张“物质刺激”、“钞票挂帅”，叫吐什么“只讲政治挂帅，不讲物质刺激，工人什么也看不到，生产能上来吗？”他们追随苏修叛徒集团，完全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妄图把社会主义建设引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全国范围的学大庆，学大寨，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的兴起，逼得刘少奇之流不敢再公开鼓吹“利润挂帅”，“生产第一”，于是就改头换面，玩弄起折衷主义的把戏，来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种折衷主义，用二元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把矛盾的双方并列起来，抹煞它们的主次之分。他们否认政治与业

务这一对矛盾中，政治总是居于统帅的地位。主张“政治和业务都第一”，“轮流突出”，“在一个时期以某一种为主”，妄图把政治这个灵魂抽掉。这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的各个方百都尖锐地进行着。

(七五年版第606—607页 参见七三年版大字本第467—468页)

四、接过革命口号，另搞一套，形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

一九七五年，黑《党史》参改再版时，朱永嘉授忌说：只要小参小改就行了，基本上不要改动，保持七三年本的局百。这次参改时，要注忌结合现实斗争，加强批孔的内容，增加批投降主义和批经验主义方百的分身。

吴瑞武也授忌说：基本的架子不要动了，多吸收一些批林批孔以来的新成果，同现实斗争有关的一些问题上，增加点新内容。

(余子边一九七八年四月揭发)

(一) 接过批林批孔口号，假借“批孔”，进行形射攻击

按：一九七四年，“四人邦”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另搞一套，不批林，假批孔，大搞批“周公”和

批“党内大伙”，矛头直指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一九七五年版黑《党史》，按照“四人邦”的调子，以歌颂毛主席和批判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武训等为名，牵强附会，塞进了大另“批孔”内容，批判所谓“折衷的中庸的路线”、“主张倒退复辟的思想”、“反对社会变革主张维护旧制度的反动历史观”等等，紧密配合了“四人邦”的反革命阴谋。

黑《党史》七五年版论述毛主席在五四运动中的革命活动时增加的“批孔”内容：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尖锐地揭露了孔孟之边是两千多年来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奴役人民的专制思想，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反动工具，人民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彻底打破孔老二礼教的桎梏。他指出只有打破孔孟之边的思想统治，才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唤起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毛泽东同志对孔孟之边的批判，推动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发尸，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代表了批孔斗争的正确方向和路线。

(七五年版第18页)

黑《党史》七五年版介绍《湖南农民运动考定报告》时增加的批“中庸之边”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武口孔孟之边。陈独秀搬出孔老二的主张倒退复辟的思想来反对革命，正当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发尸的紧要关头，他却叫吐什么“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竭力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痛斥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尖锐地批驳了中庸之边一类反革命谬论。

(七五年版第61页)

黑《党史》七五年版介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时，增加的批王明亡传孔孟之边的内容：

错误的政治路线总是以错误的理论为基础的。抗战以来，王明从“左”跳到右，推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时也在理论上亡传参正主义和孔孟之边。他鼓吹要发扬“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些所谓“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叫吐要屎来敌对的阶级、党派、军队，都在“仁爱”的旗帜下“相互礼让、相互尊重、相互敬爱”。

(七五年版第225—226页)

黑《党史》七五年版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增加的“批孔”内容：

这场斗争，是建国以后，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战役，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对孔孟之边和投降主义的第一次大批判。

(七五年版第426页)

黑《党史》七五年版借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进行形射攻击：

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百尸开后，他（注：指梁漱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学着伙家“为民请命”的腔调，把自己打扮成“农民的代言人”……在批判梁漱溟用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思想武口孔孟之边时，毛主席指出：孔夫子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就是说，孔夫子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一切革命的、爱国的人们，应当同他那一套划清界限。

(七五年版第454页)

黑《党史》七五年版论述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增加的“批孔”内容：

刘少奇一伙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就是孔孟之流反对社会变革主张维护旧制度的反动历史

观。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百、主流方百，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非主流方百。因此，他们必然反对社会变革，主张复古倒退，反对马列主义，推行修正主义。

(七五年版第464页)

(二) 接过批投降主义口号，别有用心地大批“投降主义”，进行形射攻击

按：在党史中批判王明路线是完全必要的。但“四人帮”借口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投降卖国路线，大批所谓“投降主义”，则是他们接过革命口号，另搞一套的反革命伎俩。联系到张春桥无中生有地诬蔑周总理“犯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的黑话，更不难看出他们的恶毒用心。

黑《党史》七三年版已有这方百形射攻击的内容，七五年版进一步配合“四人帮”的阴谋，塞进了大另批“投降主义”的内容，变本加厉地形射攻击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九六九年夏，张春桥借谈党史为名，诬蔑、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在抗日战争初期“犯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

(王知常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揭发交代)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吴瑞武作学习《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文章的辅导报告，在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迳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一些人的头脑时，胡说：“如果中美迳交的话，又可能有一些人被冲昏头脑”。形射攻击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斥党史组同志揭发)

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第二次迳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

(七三年版上册175页)

黑《党史》七五年版介绍《新民主主义论》时增加的批“投降主义”的内容：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百，变为世界反革命力另的一下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百，变为世界革命力另的一下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迳路是没有的。”这个光辉论断，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正警告。……这也是对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深刻批判，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阶级投降主义，便必然会滑到反革命方百去。第三条迳路或者中间路线是没有的。

(七五年版第227页)

注：黑《党史》的这段文字，把毛主席对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批判，说成“也是对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深刻批判”，表面上是批王明投降主义，实际上是别有用心。

黑《党史》七五年版在写党的洛川会议时增加的批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

洛川会议的这些决定，也是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的结果。会议期间，屁来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些人，由“左”跳到右，幻想依借国民党进行抗战，……洛川会议的这些正确决定，实际上是对王明提出的“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等右倾机会主义口号的批判和否定。

(七五年版第188页)

注：七五年版不仅增加了这一大段批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内容，而且把《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一节，由七三年版的九页篇幅一下子扩大到十五页，大大增加了批王明投降主义的份另，批判的调子也升高了许多，显然是为了形射攻击。

黑《党史》七五年版全盘否定长江局，进行形射攻击的有关内容：

会后，他担任长江局书记的职务，到武汉工作。在那里，王明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大搞独立王国。

(七三年版上册第177页)

他把持长江局的领导，把它变成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独立王国。

(七五年版第200页)

注：与七三年版比较，黑《党史》七五年版把整个长江局打成“独立王国”，这不仅蓄意抹煞周恩来、岑必武、叶剑英等同志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历史功绩，而且是借此进行恶毒的形射攻击。

(三) 接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口号，大批“经验主义”，进行形射攻击

按：把广大革命老干部诬蔑为“经验主义者”，把敬爱的周总理诬蔑为“经验主义的代表”，这是“四人帮”及其余党蓄谋已久的。一九七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战斗号召，“四人帮”另搞一套。三月，张春桥抛出了“以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黑纲领，姚文元在他的黑文中歪曲引

用了毛主席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时所作的关于批判经验主义的指示。七五年版黑《党史》又立即跟上，照搬姚文元的办法，进一步形射攻击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九七五年四月，朱永嘉恶毒攻击说：经验主义主要是老干下的问题。延安歪风期间，总理就是经验主义的代表。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揭发交代)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歪顿党的作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一伙就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他们……必然要在革命实践中遭到破产。在我党的历史上，也有一些人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他们……往往被教条主义俘虏，并成为它的助手。

(七三年版上册第211页)

注：毛主席在《歪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接着又指出：“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黑《党史》却采取阉割的手法，不引毛主席关于教条主义更为危险的指示，把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并列起来。

七五年版增加的批判“经验主义”的内容：

毛主席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下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号召全党从思想、政治、经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七五年版第526页)

注：有着重点的干分，是七五年版新增加的。

他俘虏了干分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作助手，从各方面对党施加压力，迫使党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

(七五年版第119页)

注：上文中，“他”是指王明；有着重点的文字是黑《党史》为了批所谓“经验主义”而在七五年版中新加的。

五、借口“突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鼓吹“黑线专政”论，打击一大片，抬出“四人邦”

按：反共分子陈伯达在“四人邦”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过程中提出：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沅，它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继续

指导，形成了一条三十年代文艺黑线，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但是，鲁迅并没有被他们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领导和团结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向这条文艺黑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七三年版上册第152—153页 七五年版第171—172页)

(二) 攻击抗战时期解放区文艺路线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继续和发尸

政治路线的斗争，总是要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出来的。抗战以来，王明、周扬之流在延安和解放区各地，通过报纸、刊物、文艺作品、书笈，以及戏剧、音乐、美术、午踢等阵地，狂热地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文艺路线，是“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继续和发尸，是为王明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

……

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思想文化界，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对这条文艺黑线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是“五四”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

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王明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伟大的歪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下分。

(七三年版上册第215—216页 七五年版第258—259页)

注：黑《党史》第二章专门写了《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深入。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节。“四人帮”的余党标榜这是过去的党史版本所没有的，是黑《党史》的“特色”。实际上，突出这一“特色”，是为了否定三十年代文艺。三十年代文艺否定了，抗战时期解放区的文艺又是“三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继续和发尸”，这样，黑《党史》就按照反共分子陈伯达的调子，把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来沅”“讲透”了。

(三) 鼓吹解放以后的十七年，在文化领域是“黑线专政”

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下，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还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对无产阶级实行反革命专政，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制造舆论。在

文艺领域中，刘少奇积极支持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一九六一年七、八月间，他们炮制了一个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在这条文艺黑线的统治下，文艺界的许多协会、团体、机关，被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权威、反动作家等所霸占，拒不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这个时期，报纸、广播、刊物、书笈、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塞满了封、资、修的东西。

(七三年版下册第152—153页 七五年版第550—551页)

刘少奇一伙顽固对抗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指示，竭力保护国民党那一套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后来，他们又极力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教育领域中长期占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教育领域领导权的严重斗争一直在尖锐地进行着。

(七三年版下册第37页 七五年版第427页)

一九六一年九月，他们炮制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工作的条例，使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更系统化了。这个条例，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实行全面的反攻倒算，抹杀教育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保护资产阶级，不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它多

方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顽固地维护封资修的意识形态。它鼓吹智育第一，书本至上，关门办学，妄图把学生培养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它削弱甚至取消党在学校的领导权。这个条例下达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更加严重了。

(七三年版下册第153—154页 参见七五年版第551—552页)

自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逐步开火起来了。尤其是自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以后，毛主席对文化、学术、教育、卫生各条战线都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些领域里的革命斗争。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刘少奇一伙极力负隅顽抗，妄图保住由他们把持着的这一分阵地。

(七五年版第620页)

注：黑《党史》否定十七年文化教育领域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鼓吹“黑线专政”论，把坚持在这条战线上的革命老干一笔抹煞。这是为把“四人帮”塞进黑《党史》鸣锣开道的一大阴谋。

(四) 吹捧叛徒江青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

在这本党史教材中……有一节专门讲了京剧革命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准备，把江专吹捧为文艺革命的旗手，提到江专名字的地方就有十多次之多。原来计划写的第七章，还提到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来由于姚文元自己感到太露骨了，建议删去，才没有正式印出来（注：早已正式印出，即黑《党史》七三年版大字本）。我还曾经设想把这本党史教材一直写到“十大”以前，更是为了吹捧“四人帮”。

（朱永嘉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揭发交代）

在这场深刻的斗争（注：指批判《清宫秘史》电影）中，江专××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多次提出要批判这电影。然而，当时窃据旧中宣部领导职务的陆定一、周扬等人，却顽固地对抗毛主席指示，拒绝对这反动电影进行批判。由于江专××的坚决斗争，刘少奇一伙终于不得不让《清宫秘史》上映。

（七三年版下册第33页 七五年版第423页）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声势浩大的批判。江专××亲自带领了“武训历史调查团”，深入武训家乡山东，在坐邑、临淄、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多天调查，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

（七三年版下册第35页 七五年版第425页）

注：《武训历史调查记》前言明白写着，调查团是由另一个人率领的。

抄载袁木向姚文元等以，由此已执笔
(姚文元) 而李进即江专

一九五四年九月，有两个专年敢于藐视资产阶级“权威”，冲破阻挠，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批判。

……

但是，这个批判却遭到了旧中宣部、周扬一伙的严重阻挠。江专××为了推动这场批判，亲自去《人民日报》编辑下，要求转载这两个专年的批判文章。然而，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之流却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为了排除修正主义的干扰，扫清开思想斗争的障碍，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意见》，严肃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的“某些人”。……

（七三年版下册第60—61页 七五年版第452—453页）

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但“四人帮”贪天之功以为己有。黑《党史》歪曲事实，无耻吹捧江专首先推动了

这场批判，狂妄地把江专凌驾于毛主席之上。

江专××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直接领导了文艺革命的伟大斗争。一九六三年江专××到上海，……组织了对“有鬼无害”论和毒草《李慧娘》的批判。接着江专××率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向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进攻。江专××深入剧团跑点，团结教育广大革命戏剧工作者，热情地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鼓励他们到工农兵火热斗争中去接受锻炼和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江专××领导革命文艺工作者，呕心沥血，辛勤劳动，对革命现代京剧从政治内容到艺术技巧，进行不断的精益求精的改进和提高，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七三年版大字本第482页)

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江专××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直接领导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伟大斗争。……

(七五年版第614页)

注：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加紧，黑《党史》对叛徒江专的无耻吹捧也大大升级了。它的七五年版把七三年版的“江专××直接领导了文艺革

命的伟大斗争”，改成了“江专××直接领导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伟大斗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下册第七章《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一目中，我硬把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徐景贤对外宾自我吹嘘的谈话塞进去，按照张春桥批准的所谓《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介》进行了大改，大肆吹捧叛徒江专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

(吴瑞武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揭发交代)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江专××在上海一手抓创作，即抓京剧革命的同时，一手抓评论，首先是抓对鬼戏和《海瑞罢官》的批判。

(七三年版大字本第483页)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文汇报》发表，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五月十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评“三家村”》一文。次日，全国各报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批判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

义罪行的高潮。

……在斗争的紧要关头，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明确指出了《海瑞罢官》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质：《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七三年版大字本第483—484页)

注：批判《海瑞罢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作出的部署。江青把消息通给张春桥、姚文元，姚文元投机写了文章。毛主席批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指出“要害问题是‘罢官’”。黑《党史》煞费苦心，把毛主席的批评放在另一处，故意制造毛主席批评并不是针对姚文元的假象。同时无耻吹捧姚文元的文章“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公然为姚文元树碑立传。

第三部分 “四人帮”及其余党在党史宣传中 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 对华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

按：“四人帮”及其余党，除了编黑《党史》外，还炮制了一批毒草文章和小册子，对党史进行歪曲宣传，为其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公开抛出反革命政治纲领，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的党史宣传中极力推行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更加猖狂、更加恶毒的攻击。

一、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一) 狂叫“没有毛主席，也会有井冈山道路”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后，王知常在布置党史组写《论井冈山道路》一文时，丧心病狂地攻击说：井冈山道路是历史发尸的产物，没有毛主席，也会有井冈山道路。现在毛主席去世了，难道就不革命了？没有毛主席也会出领袖的！

(反党史组同志揭发)

(二) 反对宣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光辉论述

一九七六年七月间，王知常在布置党史组写一篇题为《要重视当前阶级关系变化》的文章时胡说：如果写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二十多年前就讲了，再讲没有意思了；如果写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毛主席也讲过了（注：王知常在篡改毛主席指示）。你说它错吗？不错，但等于不讲，等于说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昨天是前天的继续一样。

（原党史组同志揭发）

(三) 否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

一九七六年七月，朱永嘉根据张春桥关于“阶级关系新变动”的黑指示，规定第三期党史学习班要以研究“阶级关系新变动”为中心主题。八月十三日，朱永嘉在党史学习班开学典礼上说：“研究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很重要。是春桥××提出的任务”，“春桥××在学习毛选四卷，说主席当时对阶级关系搞得很具体很清楚，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不甚了了”。

（原党史组同志揭发）

二、反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一) 诬蔑“周总理的世界观也是民主主义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王知常曾在办公室对我说：“周总理的世界观也是民主主义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时代，从民主革命阶段过来的人，也不能不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核心成员王绍玺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揭发交代）

(二) 诬蔑周总理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走的是“城市中心”的弯路

一九七三年夏，朱永嘉攻击说：看来，托派的要害是关于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和王明路线的观点很近似，批托派对批王明路线有现实意义。其实，上海的三次武装起义也是学苏联的，走的还是“城市中心”的弯路。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二月九日揭发交代）

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使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成功地夺取了武口，取得了起义的胜利。这是世界工人武装起义史上的有数范例之一，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

页。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还没有提出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因而根本不存在什么“城市中心”的边路，这完全是朱永嘉的诬陷。朱永嘉把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与“托派”和“王明路线”胡扯在一起，叫嚣“批王明路线有现实意义”，那更是对周恩来同志极其恶毒的诬蔑和攻击。

(三) 恶忌抹煞周总理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功绩

(一九七六年)王知常在听取汇报《中国现代史丛书》之一的《中国工农红军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编写工作时，胡说：当时歪个路线错了，只有周总理正确，错误路线下突出一个正确，这讲得通吗？我看不能写！

(余子边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揭发)

注：《中国工农红军五次反“围剿”战争》一稿，其中关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本来写了周恩来同志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使这一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但由于王知常的黑话，改稿时把周恩来同志的光辉名字删去，而用“红军总下”来代替。

(四) 借批孔文章形射攻击周总理

一九六九年十月，王知常在参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动》一文时，就明确提出了“五四以后，专孔与反孔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的反动谬论。

(吴瑞武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揭发交代)

按：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当叛徒江专发出要批所谓“党内大伙”的反革命叫嚣后，吴瑞武重复鼓吹过王知常的这个黑观点。当时，斥上海市委写作组炮制了大另所谓批孔文章，对敬爱的周总理进行形射攻击。吴瑞武也一再布置党史组炮制黑文，下白是一个例子。

斥党史组化名史锋炮制的《抗日战争时期专孔与反孔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中的反动论点：

“抗日战争时期的专孔与反孔斗争，是当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重温毛主席在那个时候的一系列批孔指示，深刻认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思想根源，对于当前深入开已批林批孔斗争，很有必要。”

“涛祿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重要的思想来沅孔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和发尸。”

“批孔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任务。”

“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由于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和分析依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也就不能彻底打败孔孟之边。”

“伟大的歪风运动，也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批孔运动。”

(见《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五) 诬蔑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动思潮”

按：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还千方百计压制和破坏群众的悼念活动，妄图在人们心目中抹去周总理的光辉形象。下边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有关黑指示。

适议《学习与批判》上的革命烈士传记一类不要搞了。南京刊物就曾以刊登了纪念康生同志等文章为理由，要发纪念总理、恽代英的文章，配合了当时以“纪念”为名的反动思潮。

(姚文元在朱永嘉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仗上的黑批示)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张春桥在北京钓鱼台听陈丕德作关于党史组工作的汇报时说：现在南京就有人提出来《学习与批判》上可以发表烈士传记，我们为什么不能发表总理传？其实

《学习与批判》上纪念康老的那篇也是可以不发，中央领导同志去世了，发这个的，不发那个的，搞得很被动。

(陈丕德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四日揭发交代)

三、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

一九七六年七月，王知常布置党史组写一篇题为《要重视当前阶级关系变化》的文章时，授意说：这篇文章重点要写一个思想，那就是党内统治阶级是分为各集团和派别的；各个时期，我们集中力量打击一个集团和派别，各个击破。解放后，先打高、饶，后打彭德怀，再打刘少奇、林彪，现在打□□□□^{那小子}还要再打别的集团和派别，一个时期着重打一个集团，拉拢另一个集团。

(余子迈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揭发)

注：这段反革命语言，和盘托出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策略，也暴露了“四人帮”余党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恶目的。当时华主席已担任党中央第一付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里所谓“还要再打别的集团和派别”，矛头直指英明领袖华主席。

托尔吉言
如华笑了弹倒于

四、反对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九七五年十月，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时，王知常扣压

了《长征期间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一文，并攻击说：“叶帅能否肯定，还是个问题。”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人员魏永征同志揭发)

注：王知常的上述反革命言行，不是孤立的现象。一九七五年底，当上海人民出版社汇编出版《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一书时，朱永嘉也跳出来狂叫：“小小的长征，也值得这样宣传！”勒令第一辑订售，第二辑不准出版。“四人帮”及其余党疯狂破坏红军长征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充分暴露了他们不择手段地反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狼子野心。

一九七六年五月，张春桥得知上海要编写《毛福轩烈士传》时，攻击说：毛福轩烈士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受淞沪特区领导，而淞沪特区的负责人是陈云，宣传毛福轩，等于肯定了陈云。

(原党史组同志揭发)

一九七六年夏，王知常看到《南泥湾访问记》一文提到了三五九旅和王震同志，强令删去，并攻击说：王震同志在右倾翻案风中陷了进去，批^那以来态度不好。

(原党史组同志揭发)

一九七六年三月，原党史组负责人对《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小册子编写人员说：写大生产运动，要注意批唯生产力论。
利润挂帅

(原党史组同志揭发)

一九七六年八月，朱永嘉看到《毛主席在井冈山》一文的草稿上写有谭震林、江华、何长工等同志的名字，训斥编写人员说：你们有个思想，就是要讨好这些人！

(原党史组同志揭发)

一九七六年四月初，朱永嘉在临编组审阅《蒋介石上台的头十年》一文时，把文中提到的包括杨开慧烈士在内的一些烈士名字删掉了，并说：现在这个时候提杨开慧，会引起麻烦的。（这是指当时北京、南京等地革命群众，刷出“我们想念杨开慧烈士”的大标语，以声讨野心家江专罪行的革命行动。）不提杨开慧，其他也索性删掉吧。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人员魏永征同志揭发)

《孟良崮战役》是于一九七四年底写成的，当时无机会登载，后来，我要登载时，朱永嘉不同意，说是别的战史登载可以，登孟良崮战役要慎重，我领会这是由于许世友同志参加了

孟良崮战役的指挥，而“四人帮”对许世友同志是很仇视的。这样，就把孟良崮战役这篇战史扣压下来了，后来一直没有刊用。

(王知常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揭发交代)

注：这不仅是反对许世友同志，而且是反对陈毅、粟裕等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同志。

朱永嘉、王知常千方百计反对编写《毛泽覃传》。一九七六年六月，朱永嘉得知毛泽覃烈士的亲属来沪协助党史组编写《毛泽覃烈士传》时，大为恼火，斥责党史组“闯了大祸”。朱三令五申要有关人员封锁消息，并拒不见面。王知常更是疯狂地叫吐：“我们庙小，容不下这样个大菩萨”，“烧香不要引进野鬼”，并恶毒咒骂：“马克思主义又不是梅毒，可以遗传”，“活人借死人吃饭，没忌思”等等，破坏《毛泽覃烈士传》的编写工作。

(斥党史组同志揭发)

一九七六年九月，有一篇题为《延安歪风期间自然科学战线的一场大辩论》的文章，文中提到李实春同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针对边区自然科学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提出应该坚持“实验室与边区生产实践联系”、“自然科学者本人

与工农结合”的正确方向。王知常看了竟大发雷霆，下令把李实春同志的事迹砍光，不准出现李实春同志名字。

(斥党史组同志揭发)

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肖木打电话来说，张春桥找他谈了一次话，说他读了《学习与批判》连载的《汪精卫卖国记》上、中、下三篇以后，恣到把汪精卫一开始就说成是投降卖国的，这样一下历史就无法理解了，汪精卫还是有一段革命的前半生，正因为他有资本，才能卖国。他这一番话的反革命目的，是利用汪精卫卖国这个问题，把矛头对着我们广大的革命老干下。

(朱永嘉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揭发交代)